

文化安全的核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文化领导权

赵婧,姜维清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在现代国家安全框架中,文化安全已从边缘问题转变为核心议题,文化领导权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这种变化反映了全球安全环境的根本转变,文化领导权不仅关系到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也关系到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国家影响力、展示国家软实力并反映深层社会结构。稳固文化领导权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内部稳定性,通过建立积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共享,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因此,重新评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是维护现代国家安全策略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超越了传统安全观念的局限,还为文化安全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关键词:文化安全;文化领导权;国家安全;葛兰西;治理术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4-0110-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4.012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Leadership as a Social Relationship

Zhao Jing, Jiang Wei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frame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al security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peripheral issue to a core issue,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element, which has reflected a fundamental shift in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s cultural leadership not only bears o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promotion, but also on building national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stage, demonstrating a country's soft power and reflecting deeper social structures. Bolstering cultural leadership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sustaining a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l stability. The cohesion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a n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by nurturing positive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shared values. Consequently, the reevalu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cultural leadership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moder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hich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confines of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notions, but pioneer new directions for cultural security research.

Keywords: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leadership; national security; Gramsci; art of governance

一、引言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总体谋划,

收稿日期:2024-02-25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自信视域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2022YJ021)

作者简介:赵婧(1989-),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安全和文化安全研究;

姜维清(1967-),男,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交织安全研究。

其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突出了文化领导权在现代国家安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现代国际政治环境中,文化安全和文化领导权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文化领导权涉及一个国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国家影响力的传播,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维护已经成为当今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拥有强大文化领导力的国家能够有效输出其文化产品和价值观,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环境。因此,文化安全不仅关乎传统的国家安全,更涉及文化认同、价值观的传播和国际形象的塑造。通过有效的文化领导权管理,国家不仅能够保护自身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还能通过文化的交流与展示增强国际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和维护,是对国家战略安全的深层次扩展,是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重要形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再次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我们面对风高浪急的安全形势,要找到定局安邦之策,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因此,借鉴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普遍推行的“文化领导权的政府治理术”,了解文化安全在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二、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变迁

“随着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并形成传统安全领域外的新安全挑战。如果说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

内容主要是非军事、非政治领域的。”^{[2](P25)}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菲利普·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明确提出,“认同”(Identity)在现代国家安全中处于核心的位置,“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的认同危机”^[3]。“认同”作为“行为者所具有和投射的一种个体性与独特性的想象,它通过与有意义的他者发生关系而形成,并持续地被改进”^[4],而“有意义的他者”的“意义”正是被文化所赋予的(价值理性)。因此,认同危机背后是文化危机,文化安全是现代国家安全之魂。

在传统安全时代,“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最主要的领域”^[5],而且文化安全并不具备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在非传统安全观念产生之前,(以文化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并没有被纳入国家安全领域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在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撑下,低政治领域的问题可以通过战争解决;二是军事安全在传统安全时代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低政治领域问题只能通过军事安全间接地显现。因此,在传统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结构中,战争问题占据着绝对的优先位置,其次是与战争高度相关的高政治领域问题,最后才是低政治领域问题。

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传统安全时代与非传统安全时代的分水岭。“因为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6](P162)},由此,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受到根本制约。在核大国“相互确保摧毁”的条件下,美苏两个核大国不得已在低政治领域中寻求优势,从文化、外交、科技等领域开展高强度的竞争,这在客观上催生了非传统安全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使国家安全结构从之前的锥形向扁平化演变。自此,以文化安全为代表的非传统的多元安全范式与传统单一的战争或军事安全范式形成了对冲,非传统安全的低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传统的高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开始

降低。

事实上,古巴导弹危机促使全人类,特别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开始评估,在“核均势”条件下,未来战争造成人类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核大国似乎意识到了核武器的发明标志着战争手段的极致化发展,正如康德哲学所揭示的那样,极致化的特征是二律背反,而核武器本身作为美苏两个大国追求绝对的国家安全而发展军事工业的终极结果,导致了两国乃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安全。最终,“(美苏)两国的军队被严令禁止直接交火,以防止诱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核冲突”^{[6](P179)},这种有核条件下的安全与威胁的二律背反或逻辑悖论向世人宣告,在当今世界,这种仅凭增强军事力量谋求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或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博弈模式已不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在非传统安全时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战争和军事的权重逐渐下降,而外交、法律等非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在各国决策日程里不断上升”^[7],战争作为实现国家安全政策手段的优先级日益降低,它不再是处理国家内部问题和外部纷争的首选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涌现,低政治领域在国家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强势上升,于是,现代国家安全结构较为明显地表现出高政治领域与低政治领域交织的态势。在传统安全时代,高政治领域的问题,如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是为战争问题服务的,与文化、经济、环境、科技等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关度不大。比如,《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8]斯大林(Сталин)也指出,“有人曾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无疑会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他会说,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方式的继续。”^[9]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

尼克松(Nixon)《1999:不战而胜》一书的出版,世人逐渐了解到低政治领域的问题同样可以作为实现国家安全政策目标的有效手段,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军事安全的类型,不仅对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而且意义更加深远,内容更加丰富,文化渗透门槛更低。例如,苏联没有被北约的武力征服,却在自己军事实力最强盛的时候解体,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国家对它发动的认知战(亦称文化战)发挥了作用。可以说,苏联在文化领域的混乱和对发展道路的迷失,导致其丧失了国家的文化领导权,这为外部文化入侵制造了机会,并最终付出了惨痛代价。可以说,苏联是因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博弈中没有取得胜利而导致解体的。这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军事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的时代终结了,低政治领域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必须确立非传统安全观念。

大量历史证明,冷战初期,为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美国对西欧各国、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教育、经济、金融交流和技术援助;冷战中后期,美国将业已成熟的非军事手段从第三世界扩展至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用以改变、弱化、瓦解苏联集团,各种非军事手段成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颠覆的主要方式。其中,通过文化渗透(认知战)推行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成为一种典型的行动模式。这种模式在冷战后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应用,越来越多的国家热衷于通过使用极具隐秘性的文化渗透去达成文化侵略、和平演变的政策目的,这在客观上拉开了低政治领域诸要素安全化的序幕,以文化安全为代表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中

强调,在当今的文化态势中,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2023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了“影响力与认知管理办公室”(Influence and Perception Management Office, IPMO),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自身影响力,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针对关键对手制定影响力战略,指导下属机构开展与影响力有关的行动,争夺目标国文化领导权。该机构在客观上承担着认知域作战的策划和指挥功能,其成立预示着:在非传统安全时代,从外部进行认知对抗的专业化、系统化和复杂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这不仅对大国战略博弈影响重大,也促使国家安全结构扁平化趋势日益显著。这将对现代国家安全结构带来重大调整,非传统的低政治领域安全问题将和传统的战争以及高政治领域安全问题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时代,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不大,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文化领域的风险。作为一种隐于意识形态、发于思想、斗于舆论、争于民心、立于法度、显于生活的重大风险,文化领域的风险具有意图隐匿、方式隐蔽、边界模糊、危害性大和文化渗透门槛低等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今时代,不仅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文化为代表的所谓低政治领域的诸多问题也是政治的延续。

三、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安全的核心

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也称意识形态领导权,最初由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提出,后来经过列宁的发展,至葛兰西(Gramsci)逐渐完善。根据葛兰西的研究,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由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两部分构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

面。”^{[10](P180)}葛兰西以阵地攻坚战打比喻:“政治社会只是前进的战壕,在它后面还有坚固的工事和地堡,猛烈的炮击只摧毁了外线工事,工事后面还有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10](P418)}这就表明,单纯的武力征服并不稳固,因为它只能夺取他国的政治领导权,难以俘获他国人心,即难以取得他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同时夺取他国的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才算彻底征服他国。因此,形形色色的认知战博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争夺文化领导权这一根本目的展开的。

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该国的文化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牢牢掌握着本国的文化领导权,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如果一国丧失了对本国的文化领导权,那么它就要被迫接受外部强加的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并沦为文化宗主国的附庸。事实上,文化领域历来是博弈各方争夺的重要阵地,对一个国家而言,文化阵地如果失守,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被侵略、被殖民。因为“客观世界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要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并被人们所掌握,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认知图式和理论框架”^[11],而文化就发挥着这样的功能。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ord Geertz)认为,如果没有文化,人们的价值理性就没有载体,因此,就无所谓善恶观,无所谓法律和秩序。文化造就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在国家层面,文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因此,文化安全事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和安全,文化领导权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观安全、生活方式安全、风俗习惯安全和语言文字安全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文化领导权在其

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目标。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个体的价值观都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因此,文化领导权作为价值尺度的调节器,事关价值观安全。

二是生活方式安全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福祉息息相关,衣、食、住、行以及空闲时间的使用,是文化安全的“日常生活”状态。“广义的生活方式指一切生活中的典型方式和特征的总和。包括劳动生活、消费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等活动方式。事实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起点,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谈不上人们的生活。但是,如果人类没有满足自身生存、享受、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12]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安全遭受威胁,文化领导权丧失,就会被别国摆布,就会扰乱社会的协调发展,影响国民的正常生活。

三是风俗习惯安全事关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因为风俗习惯体现着社会的传统,表现为一国人民的习性、风尚和礼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俗习惯就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人们世代遵守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民族风俗、传统礼仪和节日习俗等。作为一国社会历史积累和传承的结果,风俗习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发挥着直接的引导与制约作用,内在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法律。在自然状态下,风俗习惯是会随着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如果因文化领导权的缺失而导致外来文化对风俗习惯进行改变,那么就构成了文化安全风险。

四是语言文字安全是文化具有凝聚功能的具体体现,因为语言文字是人类进行沟通的主要方式,它既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民族主体性的重要体现。通过语言文字,人们得以保存和传承本民族的文明成果,因此,语言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是一定的说话人与话语对象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展开的沟通活动……话语同时是构建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每个话语都包含一定的意义体系,这些体系一起构成了社会知识网络,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基础。话语的形成依赖于语言的使用,语言之所以可以建构话语危机,主要是由于语言本身不但具有表象功能,还具有建构功能”^{[2](P19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如果外语在一国过度传播,就会威胁本国语言,从而造成本国国民对外国文化的过度认同,甚至被其同化。正如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所说:“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消失。”^[13]事实上,语言文字的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存在着某种辩证关系,当一个国家兴盛时,该国语言文字必然兴盛;当一国衰落时,该国语言文字必然没落,甚至国家的灭亡通常伴随着本国语言文字的消亡。因此,保障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既是衡量一国文化领导权稳固程度的标尺,也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时代,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总体国家安全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领导权安全的“形而上”问题

在西方传统安全视域下,人们通常只看到当代安全秩序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正如葛兰西提及的“政治社会”,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强制机关的监管。事实上,这只是安全这座“冰山”在海面上显露的小部分内容,在海面下还隐匿着更深层的大部分内容,即一种“文化领导权的政府治理术”(Technique hégémonique de gouvernement),它通过调整自由的形式,根据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创造出对安全有更高需求的主体。在西方传统安全视域下,安全被视为人与人之间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就隐藏在国家机构和技术对象之中。

事实上,安全作为实践、制度和社会关系的集合,在维持和稳定现存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借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将安全认为是对叛逆主体的镇压或预防的过程的观点是对“法律一否定”(Juridico-négative)权力理论的应用^[14]。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传统安全色彩,它强调从“反应”(Angle réactif)的角度来看待安全过程,且只将安全过程从对抗和被打压的时间性角度来理解。但是,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社会的安全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升级,以及西方落后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西方社会内部的劳资矛盾被重新整合,使得直接使用国家武力来镇压日益减弱的社会运动和抗争变得越发不必要。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到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安全的主体不再只是军队、警察等强制机构,学校、图书馆、媒体、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公司、医院等机构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由此,高政治领域与低政治领域的各个机构在维护现行国

家安全秩序的过程中呈现一种交织状态。那么,在这种新形态的安全阶段,即阶级矛盾不再以公开的对立和大规模的斗争形式出现时,如何解释安全呢?换句话说,根据西方的经验,新型安全是如何被构建的?它是如何参与到稳态社会循环和隐性的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

关于新型安全的建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安全在阶级结构再生产中的角色。葛兰西认为,构建稳态社会的重点在于循环,而这种循环表现为一种稳定的阶级关系再生产,稳定作为这种社会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要求治理者不能仅仅依靠硬实力去“支配”(Dominate),还应该善于使用软实力通过获得文化领导权来实现对既有社会阶级结构的调节,即“必须赢得统治阶级其他派别和大部分下层阶级的同意和支持,必须把自己包装成是普遍利益的保障者”^[15]。事实上,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力,要以市民社会自觉自愿地接受为前提。如此,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不再是旧的国家管理模式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单向关系,“文化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一种教育关系”^[16]。当然,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或通过真正改善民众的物质条件来获得同意,并不意味着不再使用武力。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为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终究还是一种“强制的防护”(cuirassée de coercion)^[17],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由此可见,在构建新型安全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并不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是:“它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通过一种流动的话语、表象和实践,在行为者和机构的组合中,将强制和同意紧密联系起来。”^[18]这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原则被西方政府广泛应用,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种新的安全形

式,即文化领导权的安全。这种新的安全形式强调威胁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对于一个主体而言(个人或社会),外部威胁带来的恐惧感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即使当前是安全的、没有客观存在的威胁,也要虚构出一种威胁来激发主体使用全部手段保持特别警惕的状态。与西方传统安全视角不同,这种新型安全观认为,安全好比是“一种无法简化为一个‘中心意义’(signification centrale)的实践的万花筒,一种口号……一种特殊的方法,通过该方法,主导群体确定谁需要受到保护、谁可以被牺牲,谁可以被指定为恐惧、控制和强制的对象,来实现监管和统治”^[19]。这种“中心意义”的缺失意味着我们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需要辨别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衍生的新形式,并从中归纳出一种具有总体性的特征。把握这种新型安全特征的重点不在于安全参与者的具体意图或意见的表达,而在于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再生产过程。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和《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中提出了“权力机制的社会治理术”的观点,马尔库塞(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描述了在西方社会中,基于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来把握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实现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再生产过程。作为一种权力形式,文化领导权不是直接对大众和个体进行干预,而是根据市场的“合理性原则”自由地调节其条件而实现文化领导。因此,安全被转化为一种基于市场的调节功能而被赋予自由主义标签的权力形式,其主要基础不是优先通过对叛逆主体的镇压,而是通过维护市场空间、其特定的自由制度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的。安全基于对个体自由制造

成本的计算,这是韦伯合理化原则的体现。它不断评估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某些行为或被认为会生成对维持市场总体平衡的风险。维护安全的各种工具以市场自由的名义示人,反过来又限制大众自由。“在这个以自由主义为名的安全结构的内部,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流动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关系,即自由在被生产的同时,摧毁和限制这种自由的风险也在被生产。”^[20]由此可见,风险计算的逻辑或风险合理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安全的一大“中心意义”,通过风险来调节社会自由的尺度是这一新型安全模式的重要功能。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不少风险或新型安全问题是人为构建的,其出现是作为一种砝码来实现特定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再生产,本质上是在构建和维系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此外,要理解文化领导权这种新型安全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贡献,我们还应该研究风险逻辑在具体阶级结构中的使用方式。在现代西方社会结构中,形成了许多稳定的阶级联盟,即所谓的统治阶级共生体,它们共同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它们需要通过树立共同的敌人来确保自身的团结,即需要通过不断地与被指定为风险的对象(小到某个地域的特定人群、大到某一族群或国家)形成对立后,再想方设法实现自身安全。这种通过文化领导权而实现的强制性同意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它不仅是一种从外部灌输给目标对象的意识形态,还是通过社会物质生产的形式给被动员起来的主体一种跨越阶级的集体身份的印象,或者通过社会福利改善大部分工人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文化领导权的背后是物质和精神的再生产,而为了维系这种再生产,统治阶级及其联盟必须将现有的生活呈现为被威胁的状态,然后通过安全的名义来限制被统治者的自

由和权利。通过这种新型安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体的生存问题不是仅限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问题,而是与被呈现为受到威胁的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对既有社会结构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新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都会被否定,这就构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

五、文化领导权安全的批判与重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现行的这种风险与安全的逻辑支配着全球社会体系的权力运行。这是一种安全的异化,安全不仅从安全专业人员的领域向社会其他部分展开,还以网络化的方式渗透至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个体的灵魂。异化安全实际上演变为一种文化霸权,它通过安全实践显示自身的存在,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强化,因而,成为贯彻资本主义精神和生产方式的有效手段。它通过不断调节和再生产既有的社会分层和种族关系来维系自身的再生产,马克思对其进行过深刻批判。葛兰西作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超越了仅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或特定阶级的世界观,而“是一种生产主体的实践”^[21]。被异化了的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各种围绕中心价值组织的言论和物质媒介,整合了其他社会群体所有表征的意识形态元素,使得自身成为社会各个利益阶层的化身,并代表各个阶层行使权利、分配资源。同时,通过引入或制造风险,形成安全化态势,使安全不仅通过国家的名义高悬于高政治领域,而且下沉到低政治领域,在构建市民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制造了基于风险理性的特定主体。在公共空间中传达安全焦虑并呼吁每个人保持警惕,同时将普通大众转变为潜在的安全参与

者,从而顺理成章地将所有人和各个领域都纳入被监管的范围。制造安全焦虑是文化领导权异化状态下构建“安全”的重要手段。将特定种族或人群贴上负面的标签,是一种典型的“替罪羊”策略。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恐惧症”就是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阵营在全球范围内文化领导权博弈的胜利。当然,将某一族群成功贴上“高风险”或“威胁”的标签不仅需要文化工具上的垄断,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即被贴标签的这一族群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对抗这种异化的文化安全的根本性条件。

此外,文化霸权的安全原则得以生效的条件之一,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种族结构化。这里的“种族”概念涉及一系列社会构建和实践,按照生物学或文化归属的分类,“根据社会的基本结构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分配一定的位置”^[22]。然后,通过文化霸权从生产和符号两方面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构建,并以这种方式获得本种族和联盟成员的支持和认可,从而维系(再生产)其文化霸权并支撑这个文化霸权的社会结构。由此,种族问题构成了维护文化霸权安全的条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现行安全观的目标不是把国家打造成“警察国家”,而是要建立软性的文化威权,以所谓的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为名,通过调节不同种族或阶层的经济和法律地位来实行长效稳态统治。在这种安全体系下,大多数人的自由保障更多地是通过削弱少数人的自由来实现的。因此,安全被展现为许多“微小的例外”,这正是西方社会维持正常运作的关键,就像在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系列“不自由”的实践一样,少数族群必须被打上“危害安全”的标签。尽管在西方内部关于安全的传统理念仍然存在,即把安全视为

对叛逆主体的镇压和预防,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持有非传统安全观的人已经成为主流。面对“文化领导权的政府治理术”,尽管部分西方民众采取了反抗态度,如摧毁摄像头、通过各种装置逃避网络监视、拒绝提取DNA等,但这些都未触及被异化了的的文化领导权。这样做就如同19世纪的工人破坏机器和厂房,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统治消失。由此可见,以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安全通过合理化原则影响民众精神和精神赖以维系的物质生产,它通过制造风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层面构成一种被异化了的的社会关系。面对这种特殊的安全类别,即这种被异化了的的社会关系,根本解决之道在于还原安全的本质,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去除安全领域内的异化元素,从根本上摒弃零和思维,改变通过树敌或制造威胁来维护国家安全之术;在安全领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和合促发展”^[23]。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异化安全逻辑,我国捍卫自身文化领导权的任务更为紧迫。这种文化领导权不仅涉及国家安全的传统领域,还广泛地关系到文化自信的巩固和国家国际形象的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的源泉,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价值导向。我国应充分利用历史悠久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弘扬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进现代文化的创新与交流。通过文化宣传教育体系广泛传播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

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多元的文化环境、浓郁的文明氛围、积极的交流互鉴,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使之愈加繁荣兴旺”^[24]。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网络平台和社

交媒体等,生产、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通过电影、音乐、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创新能力及其传统与现代的和谐融合。此外,中国应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文化机构的决策,增强在国际规范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以确保国际文化政策中的中国利益。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作原创性内容;不断促进国内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以形成一个多样而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构建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创造有利的文化条件。此外,要加强国内外文化政策的协调,在处理对内和对外文化政策关系时充分考虑文化安全的需要,确保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能够支持国内的文化发展和保障国内文化安全。为此,建立和完善文化安全的评估和保护机制至关重要,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加强对关键文化产业的监管,保护国家文化资产免受不正当竞争和外来文化侵略的威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筑青年一代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的基石。在稳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需“确保旗帜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25]。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确保新一代青少年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尤其需要加强网络空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引导网络文化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措施将确保中国不仅能有效应对全球文化霸权的挑战,还能在国际社会中推广以“和合”为核心的全球安全观,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26]。

[参考文献]

- [1] 章雅荻,余潇枫.和合治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建构[J].国际观察,2023(2):42-71.
- [2] 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3] Huntington S P.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identit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12.
- [4] Katzenstein P J.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20.
- [5] 姜维清. 交织: 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205.
- [6] 牛军.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7] 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概论(下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
- [8] [德]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M].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40.
- [9] [美]威廉·奥多姆. 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M]. 王振西,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15-16.
- [10]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葆煦,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1] 李辽宁.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挑战与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14(6): 15-18.
- [12] 朱贻庭. 伦理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35.
- [13]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 柴方国,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64-65.
- [14] Foucault 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M].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68.
- [15] Gramsci A. Œuvres choisies[M]. Traduction et notes de Gilbert Moget et Armand Monjo.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59: 231.
- [16] [意]葛兰西. 实践哲学[M]. 徐崇温,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33.
- [17]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103.
- [18] Krickeberg M, Guillibert P. L'hégémonie de la sécurité[J]. Vacarme, 2016, 77(04): 38-44.
- [19] Balzacq T. Security practices in denemark[J].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Online, 2010, 43(02): 33-37.
- [20] 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M]. Paris: Gallimard, 2004: 376.
- [21] Mouffe C.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170.
- [22] E. San Juan, Jr. Difficultés dans la théorisation marxiste de la race[EB/OL]. Revue Période, https://frama.link/G_OjAb9G.
- [23] 余潇枫. 新安全格局的理论意蕴与实践向度[J]. 国家治理, 2024(3): 24-29.
- [24] 肖瑶, 钟宪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理论析[J]. 行政与法, 2024(4): 43-55.
- [25] 项久雨, 李念念. 文化安全视域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10.
- [26] 余潇枫. 广义安全的本体、视界与范式: “关系和合度”解析[J]. 社会科学文摘, 2024(2): 60-62.